

光緒22年(1896年)初,新任駐日公使裕庚派署官呂賀運到上海,亦由一帶招募學生,經過選拔,由沈寶雲、錢寶琛、胡宗漢、朱兆光、呂烈輝、呂烈輝、馮國璋、王金華、劉麟、郭壽南、李潤濟、王業、趙其等13人隨裕庚赴日,裕庚將這些學生委託於當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兼文部大臣的西園實博,西園實博即委派成東流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松尾治五郎承此項教育任務,中國留日學生的歷史便從此拉開帷幕。

據有關資料介紹,1896年至1899年,在日留學生只有七十人。1905年至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達到第一次高潮,總人數超過2萬人,有學者推算指出1896年至1937年,四十餘年中國留日人員約10萬人之多,這是中國史上未有過的現象。隨時代倒置是日本曾向中國派過遣使、留學生,這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長河中曾被傳為佳話,給日本的文化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摘金奪銀 莘莘學子多奇志

去年,我應邀到東京參加(讀家新聞)主辦的“愛護地球”在專門學校以上學習的外國人分別統計,因此,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又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中國留日學生就學在日最多的年份是1988年,高達28000多人。上海青年為之發狂,在日本領事館前靜坐示威的“上海留學生事件”就發生在這一年。據在日中國人發行的中文報刊報指出,從那以後,就學生身份日趨普遍,簽證成功越來越難,在日的留日學生也越來越少,現在約15萬2千名之間。

既然是潮流,那麼肯定是泥沙俱下。赴日留學大軍里,有三教九流也是正常的了。加上日本報刊對中國人在日犯罪、拚命拚錢等現象突出報導,所以造成在日中國人的形象一天比一天亮,導致某些人形成了“留日學生”“总体素質最低”的印象。

也是那個時候,我還收到在日中國學者趙軍的傳真,盛情邀我去神戶採訪他獲得孫中山研究紀念獎的儀式。據此以此獎設立以來一共授獎2次,兩次獲獎者均是日在日的中國人。

幾乎是同一個時候,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获得者,現在日本東北大學藝術系副教授的張克,榮獲“三得利學藝獎”。在過去7屆受獎者名單里,中國留學生的名字還有女子劉春紅。

正當年的莘莘學子成果累累,他們的在日子女亦“青出于藍甚于藍”,不久前從大阪傳來湖南老鄉羅德勝三女羅雪(12岁)捧日本NNTT作文比賽優等獎的消息,全日本有幾萬名中小學生參加,來日僅有3年的羅雪一鳴驚人,用流暢的日語說了一個“媽媽與中國孩子”的故事,專業從東京趕到大阪為羅雪送獎牌的主辦單位代表。對這位唯一的在日外國人獲獎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為像羅雪一樣聰明、勤奮的中國人后代何止有在在。

1992年筆者抵日不久便注意收集這方面的信息。現在至少可以列出100多人次在各種全日本評獎中摘金奪銀的記錄。

著書立說 負笈東瀛寫春秋

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新聞出版活動亦是成果喜人。本世紀初,當年的留日中國人在日本發行人大的中文報刊,現在留日中國人除了繼承和發揚先賢的優良傳統外,還做出了許多前所未

有的貢獻。10年來,中國學生先後在日本發行報刊50多家,至今仍在繼續發行的報刊就有15家,對在日中國留學生來說,這些報刊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溝通祖國和在日中國人的信息交流,傳播中國的傳統與現代文化,是中日交流歷史的最好記錄者,是將研究20世紀80年代來日中國人的最好資料。

中國人留日100周年,出了角迅、郭沫若等日文著,但他們沒有出版直接用日文的著作,是改革開放後留日中國人,在直接採用日文著書立說方面超過了比前輩們更加輝煌的方面,儘管中國的日語著書歷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但後來30載,沒有日語著書問世。從1984年至今僅12年時間,上百位在日中國人向社會奉獻了200本用日語直接寫的專著,內容涉及人文、社會、經濟、政治、醫藥、技術等許多方面,最多的要數山東留學生孔建10年出版了30本日文專著,居在日中國人日文著書之魁。女性著者越來越引人注目,現在

年代的現代中國人留日的口數也不亞於當年的盛況,這20餘年間亦有10來萬留日獎賞了。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出於對祖國危亡的深切憂慮和懷故中華民族的強烈情感,許多有志青年東渡日本,尋找真理和報國良方。

第一批留日的唐寶瑄等13名中國留學生,堅持學完的只有7人,其餘人因為“受不了日本人的規條,不習慣日本生活”而很快“乘返故里”。

當年大清留日學生吳玉章和他的同學在成城學校參加留學生同學會時,萬國旗不見了那面黃龍旗,於是道反遭到校長那里,最終黃龍旗在空中招展,吳玉章他流下了動人的眼淚。

陳天華看到日本報章對中國民族性的污蔑,通霄達旦撰寫了絕命書,然後在日本的大森海岸投海自盡。留日學生每次先昂然自來時,隨風送來陣陣海聲,似乎都在復誦着他那著名的《猛回頭》,“諸君慎,甲午年,天下戰陣;諸君慎,庚子年,慘運

留學日本

系病;痛只痛,割去地,萬古不返;諸君慎,所願款,永世難忘……”

在日本留學、亡命各10年的郭沫若曾說過,“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文,受的是東洋氣”,郭沫若到他的代表作《沉淪》里思考,“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要求學,既然到了日本,那么自然不得不做一個日本人輕侮的。”

八十年代後來的日中國人,雖然也嘗過留日與留日學生的那種交流,但更多的人喊出“留日學生何在?”雖然也遇到像五十年後那樣,某店例明也要幫助中國留學生的熱心日本人,但听到的“本音”(真心話)是“不喜歡迎這麼多中國人來日本”,在東京這座文明的大都市里,曾幾何時,“中國人不得入內”的招牌掛在了遊戲中心門口,“禁止中國人”的標語口門在中國人某地地有所見,“中國人黑社會分子橫行高國”的標語,不斷地出現在各種報刊上……每每探讀新發生的疑案,《日本留學精神史》,常常產生“今天與昨天何其相似乃爾”的联想。

留日學生深感“歷史最有惊人的相似之處”,這種相似的背后又是滿腹冤實。一位中國知名青年畫家在他的“東瀛畫記”里寫道:“我為之學志業,得忍受身價價值、技能評價的白眼時,又承受了不知凡幾。”

國家的遭遇我以為還是好的了,那些連日語的五十音圖也不會的同胞,一邊奔波於日本語學校,一邊拚命於打工混飯,不少人記住的每一句日語是“打梅”(日語的漢字是“駄目”,意思是“不行”、“不准”、“不好”)和日本的國語“八格野郎”,从字面似乎也能体会到它的侮辱。

從100年前的日本“脫亞入歐”,到今天的看不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日本在打着接收100萬留日外國學生的口號的詞

常事,最多的先後加起來暴了60多萬不動產,遇到的都是冷面孔。

留學生最怕什麼?最希望什麼?

好多中國留學生說,最害怕的地方是日本的入國管理局,最不願看的是那些簽證官的冷若冰霜的臉,最不希望的是在日中國人被抓被罰被處死的消息……

和百年前的中國留學生相比,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未嘗被磨滅,在民族危亡、民族精神、民族危亡方面是無法同日而語了。早年死在日本的中國人,正史記載的除陳天華自縊以留日同胞“堅忍奉公、力學愛國”家鄉呼喚外,還有十幾名“憤死”他鄉的中國人,如因馬關條約的簽定而投身馬關海域的福州留學生陳履一。

這十幾年,死在日本的中國人粗略統計上百,除陳天華自縊死於自然災害的20多名外,中國人自相殘殺、或被日本人所殺者占了相當比例。日本战后50年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外國人又是中國人。在挂著“中國人不准入內”的招牌後,仍有同胞為那幾個割破良心忍受那種歧視與侮辱。至於那些拿著國家的錢、人民的血汗培養起來的留學生們踴躍了不飛向祖國的“忘恩負義”,只能等待時間老人的判別了。

應該感謝改革開放政策把几十万中國學子推向了求學知識的道路。他們在日本坐到了日本語學校,一邊拚命於打工混飯,不少人記住的每一句日語是“打梅”(日語的漢字是“駄目”,意思是“不行”、“不准”、“不好”)和日本的國語“八格野郎”,从字面似乎也能体会到它的侮辱。

從100年前的日本“脫亞入歐”,到今天的看不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日本在打着接收100萬留日外國學生的口號的詞



紀念清華大學建校84周年暨清華大學東京校友會成立大會



每逢佳節倍思親,新春之際,中國留學生積極高歡,抒發思鄉之情。



三年前五十五位先生成立了“中國留學生後援協會”。



中國留學生以傳統的中国餃子謀生存、求發展,傳播文化與友誼。

五十歲勝的「謝謝の樹」出版を祝う會

(株) 東京新聞社 日本出版者協會 株式會社出版

著者: 中國留學生 文部省中國留學生會 中國留學生會 40000多人。最近他創作了《謝謝の樹》。

泉文

第七期

封面設計 楊大昕